

中国小说现代化五十年

雷锐 著



中国小说现代化五十年

雷 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小说现代化五十年

雷 锐 著

责任编辑:郑纳新

封面设计:张 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1 字数:364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633-2723-1/I·249

定价:20.00 元



雷锐,男,汉族,1947年2月生,籍贯广西南宁。1982年毕业于广西师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班。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现为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广西师大图书馆馆长。著有《柏杨评传》、《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主编)等10余种,现代文学论文130余篇。多次获省、校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引 言

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文化浩荡奔流的长河中，文学是最具活力、最丰富多彩、始终溅沫扬波的水流。中国文学中数不清的璀璨闪光的诗歌、散文，脍炙人口的小说、戏剧，陈列在世界文化精品的殿堂里，和其他民族的艺术作品一道，将人类的精神宇宙映照得无比辉煌。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为这一份丰厚珍贵的精神财富骄傲自豪。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民，也不得不对之投以敬慕的目光。

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另外三大支流——希腊文学、印度文学、希伯来文学稍有不同。神话和史诗始终没掀起足够的声势而形成文学的源头^①。特定的历史条件，使短小的抒情诗和史传散文及说理政论散文蓬勃发展起来，以后，代代相传，诗和散文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

由于神话幻想和史诗夸张而引发的有意识的艺术虚构土壤的贫瘠，中国小说和戏剧的发生和发展就比较缓慢，甚至出现如鲁迅

^① 与汉民族的文学相映成趣的是，中国不少少数民族在文学的初期都有自己宏大的史诗出现，可惜它们不能在中华文学中占领导地位，因而影响亦逐渐消失。

多次不无遗憾地说过的情况：“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①，“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②，“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的”^③。因此，小说自古无史，也就不值得奇怪了。但是，小说作为一种极为有效地反映人们生活精神理想的文学形式，终究还是要在文化园地绽芽抽叶的。远在史前时期，先民们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里就包孕着中国最早小说的胚芽。先秦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更是使小说的浆液进一步膨胀。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迷信盛行，清谈风气大炽，从诗和散文的余绪中衍生出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小说开始作为一种文体破土绽生于中国文学的园圃。到唐代，文言短篇小说传奇出现，小说终于基本成形。我国古典小说出现了第一次体式格局上的跃进。宋元至明初，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话本”刺激的加工和再创作，中国古典小说出现了又一次重大飞跃——长篇小说出现并迅速趋于完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问世，使中国古典小说终于在世界小说之林中占到了一席之地。明中叶以后“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大批涌现，虽然它们在体裁上与现代短篇小说的标准有距离，却积累着中国古典小说内部的离心力，特别显示了中国小说创作的强大后劲。到清朝，由于“乾嘉盛世”特殊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统制，正宗的诗文日渐衰落，小说戏剧却继续迅速发展，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长篇《儒林外史》和具有丰碑意义的《红楼梦》，终于将中国古典小说推到了历史的高峰。

中国小说出现虽然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但到明清，却突然

①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见《鲁迅全集》第6卷，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② 《徐懋庸〈打杂集〉序》，见《鲁迅全集》第6卷，2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③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5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加速，一下子走过欧洲小说需要双倍时间才走完的路程。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中国小说到现代，应该会赶上世界小说的潮流。然而从19世纪开始，外国小说也加快了步伐。批判现实主义才独领了几十年的风骚，现代主义各流派便是纷至沓来，使人眼花缭乱，从而拉大了与中国文学的距离。最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中国社会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最绝望的时期。

当历史的巨页翻到19世纪中叶，曾经显赫一时的明清王朝，已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神州大地，差不多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中华儿女，惨遭殖民主义者的凌辱欺骗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毒害，民族精神日益萎顿，民族体魄日益孱弱。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生活陷于水火。疮痍满目，饿殍遍野，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折映的文学在呈现出她痛苦的萎黄病弱模样时，却出现了小说畸形的繁荣。

清末小说一度出现的“繁荣”是奇特的。腐败黑暗到极点的时代，刺激着有良知的作家操起讽刺的笔，清末就因此出现了《官场现形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鲁迅给予一定评价的“谴责小说”，并出现了在讽刺中融入颇为精彩的景物、心理描写的《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翻译小说乘着欧风东渐，迅速出现在出版界，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占领广大读者市场。风靡一时的林译小说和严复的“信、雅、达”翻译原则，就出现在那个时期，成为翻译史上的大事而让后人瞠目。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阵地前所未有的扩大。据不完全统计，经常刊登小说的小报有30多种。著名的有《演义白话报》、《繁华报》、《笑林报》、《寓言报》等^①。以刊载小说为主的期刊更多，甚至在1872年即有《瀛寰琐记》创刊，其后更有《海上奇书》、

^①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转引自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1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特别是著名的商务印书馆 1910 年创刊的《小说月报》等 30 多种^①。此时期的创作和翻译小说，也是空前繁荣。《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到 1911 年收录创作小说约 120 种，翻译小说约 40 种。然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则说，当时创作以单行本出版的小说肯定有 1000 种以上。这个数字大约是可信的。而《小说林》杂志第 9 期《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仅统计了丁末年（1907）一年内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出版数字，就总计有商务印书馆等 13 家出版机构共 142 种。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录》统计晚清 40 年，翻译小说多达 60 多种。以上数字即使在 30 年代也相当壮观，更何况在民智仍十分闭塞，出版业刚刚启动不久的清末！从这些小说出版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来看，晚清小说之繁荣真正是前所未有。

综观中外小说发展的历史，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规律：小说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资本主义以封建主义远不可想象的强大的生产力，横扫保守迟滞的小农手工业生产方式，用无远弗届的商业纽带把世界各地联结起来，从而催生了大大小小的近代商业都市、城镇，也就扩大和增加了市民阶层和一般小知识分子的数量。对他们来说，情节曲折、人物生动、便于反映日常生活的小说、戏剧更适宜于他们日常的消遣和审美趣味。读者观众的爱好无疑是一种文学形式得以刺激生长的营养，而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经销方式，又让小说在迅速印刷和广泛流通上超出戏剧。于是，这种文体便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风长起来。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小说长足发展，明清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的发展带来小说的繁荣，都是这一规律的有力证明。晚清资

^①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转引自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106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和戕杀,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多多少少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也或多或少地刺激资本主义商业在中国的蠕动。晚清的经济状况虽然仍是封建主义占优势,但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膨胀和蚕食,已成不可遏止之势。也正因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加上特殊的政治思想理论推动,使晚清小说的繁荣带上畸形的特色。

晚清小说的畸形繁荣,使中国古典小说呈现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征兆。它们更多的是以量取胜,而不是以质征服读者,《红楼梦》、《聊斋志异》之类的巨构已不可再。它们的消遣功能更强。清末民初,小说的思想性、教化作用弱至于无。一度兴盛的鼓吹革命的“政治小说”、“种族小说”已基本被卿卿我我的言情小说,简直是教人“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①的黑幕小说,宣传迷信、因果报应和形形色色封建观念的武侠小说所取代。无病呻吟的鸳鸯蝴蝶派成了小说界的台主。《礼拜六》一类无聊庸俗的杂志成了小说出版的主流。封建复古主义和殖民地买办文化联手起来,将晚清小说一度眩目的光彩掩盖了去。中国古典小说在两千年发展过程中沉淀下的消极因素已积至极限的边缘,而其内部呼唤新生的声音也日渐强大。20世纪新时代的霞光已现天际,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大批民族主义国家从近代向现代迈进。革命的风潮开始拂卷全球,文学变易,小说现代化的胚芽已在中国古典小说体内凝结,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胎音已隐约可闻了。

“现代化”的概念,在八九十年代以来广泛地使用,以至使用者和接受者已经不再注意它的确切的内涵。似乎在约定俗成之中,“现代化”即是“进步”、“科学”的同义语。这虽然也抓到了这一概念的实质,但不免空疏、泛泛,再想进一步探究,便难得到那怕稍多一些的内容,更遑论准确地诠释其丰富的意蕴了。20世纪以来,人类

① 宋云彬,《“黑幕”书》,载《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社会被现代化的潮流漫卷，虽然有的国家步伐稍快，有的国家速度较慢，都无法不顺从这一宏大潮流的行进。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其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教育的现代化、军事的现代化等等。这些现代化的进程涉及并逐渐深入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学的现代化自然也受到影响、推动。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以小说的现代化最为明显、突出，可以说，中国小说正是在 20 世纪之初告别了古典，进入了现代。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贯穿着一条不断现代化的规律。

所谓“现代化”，依笔者看来，指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而进行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它是一个发展的、运动的概念，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从总体上考察，现代化的进程是和社会技术、制度、文化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里，它有着不同的物质基础、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指标体系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由这一概念，笔者认为所谓“小说现代化”，指的是小说用比以前进步的、适应扩展和深化了其本质功能的表现方法，能动地反映所有适应时代进步进程的思想、行动、变化、结果内容的过程。具体地说，小说现代化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小说概念、性质、功能适应着世界发展潮流、时代进步进程发生了变化；

小说准确地、能动地反映了生活、社会的本质、时代前进的规律和方向；

小说准确地、能动地反映了整个人类（在中国，主要是中华民族）对自身主体认识的发展和深化；

小说在传统基础上，开放地学习、融汇了外来优秀技巧，创造了更能发挥小说功能的表现方法；

小说在审美趣味和提供思维方式的启示上多元地适应丰富现代人的需要；

小说现代化是一种开放的，运动的过程，并在运动中不断自我完善，在运动中主动与世界各国优秀小说交流和融汇。

其实，在西方现代意义“小说”这个词的本义上，就已经含有不断变化前进的含义，英语 novel，法语 nouvelle，俄语 Новелла 的词根都有带有“新”的含义，可见最先发明制造“小说”这个词时，操作者首先总结小说的本质特征便是“前进”、“进步”。汉语“小说”的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肯定比欧洲各国早，但只作“小道理”解，带有贬义。两相比较，欧洲的小说观念是要比中国进步，也“现代”。然而不论中外，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中一种的文学，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从产生之日起，便总是在不断前进、进步的，其大方向是“现代化”的，当然在发展途程中也有曲折、迂回，甚至倒退，但终归要往“现代化”的方向走。

当我们将小说现代化这个概念的内涵透彻地认清以后，我们面前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纷繁复杂、晶莹闪烁的小说作品便仿佛从内部透映出一道明亮而稳定的光流。数不清的小说都在向这道光流靠近，努力融入其中；有的小说却在闪瑟地躲避这道光流，抗拒光流对它们的吸力；有的小说甚至逆光流而动，企图将光流扑灭。然而光流的力量是那么雄浑厚实，方向是那么明确执著——中国 20 世纪小说朝着现代化道路行进的过程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这是不可抹煞的文学事实。这个事实的开端，恰恰就在 20 世纪史页刚刚掀动的时候。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序幕.....	(1)
第二章 鲁迅——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先锋和奠基者	(16)
第三章 诞生期小说现代化的轨迹	(53)
第四章 成长期小说现代化的步伐	(75)
第五章 成长期小说现代化的足印.....	(112)
第六章 茅盾——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重镇.....	(149)
第七章 老舍、巴金——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积极推进者	(190)
第八章 成熟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长足迈进	(221)
第九章 成熟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飞扬激荡	(262)
第十章 抗战前、中期：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艰难跋涉.....	(303)
第十一章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分流.....	(355)
第十二章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重汇.....	(401)
结语.....	(429)
主要参考书目.....	(447)
后记.....	(448)

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序幕

19世纪后期,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以及沿海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在政治上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它们逐渐形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改良主义者们在政治上要求改变现状,变法图强,引导中国通过君主立宪走向资本主义,由此形成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他们十分重视启迪人的理智,廓清社会的蒙昧,唤醒民众,推动改革。

要启蒙,必须有工具。出于一种对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又带有一定艺术趣味,易于吸引人的文学体裁——小说的微妙感觉,甚至是一种考虑未必周到,拿来先用的试验的想法,这些启蒙思想家把目光注视到小说之上了。

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这个大题目下的《论幼学》一文中,开始将小说提到前未有过的高度。他说:“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过之可以旁及夷情。”这里说的“群书”,指的是“说部书”,即小说。

1897年,夏曾佑、严复二人合作,写出了近代中国第一篇专论小说重要性的万言长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这里之“说部”,亦即小说。文中不惜夸大小说作用,说“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

小说之助”。“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他们居然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放到封建文化的顶点——经史之上，其影响的惊世骇俗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也对小说表现了极大的热忱，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海外，听说有人要以变法为题材写一部小说，即预先赋诗寄望。这首题为《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之速之》中，说他开始感到小说在救国中的重要，将小说观念改变的问题提到历史、时代、社会斗争的需要这个高度来加以论证，显示了这位改良主义理论家的睿见卓识。尤其是他还注意到小说在民间流行的情况，专门到上海的书籍市场作过调查，发现群书之中，小说销路第一。由此可见，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1898年，梁启超又在流亡日本创办的《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总结了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小说发表的种种观点，集中地指出：“小说为国民之魂”。欧、美、日本各国的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他主张用小说来代替六经、正史、语录和律例，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他明确宣布，他倡导尊崇小说的意图，是在“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他建议扭转历来对小说的观念，将小说在文化领域中的地位放到至少与经史子集并列。

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关于小说改良理论之大成者，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名文挟20世纪之门洞开的劲风，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诚为当时文学界之排空大浪，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序幕启开的标志。梁启超在文中进一步推崇小说的社会地位，规范小说的界说类别，研究小说创作的指导理论，总结小说发展的历史经验。文章开篇，则大胆新奇，虎虎生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

新小说”。文章结尾，又是耸人听闻的警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该文发表以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论点，几乎成了文学界一时之独响，极领一时文学理论之风标。以后的说文论著，如夏曾佑的《小说原理》虽也从人的娱乐工具角度立论，狄平子的《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从文章的性质分为矛盾两方面立论，王无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从救国之角度立论……但都大致只是梁氏观点的阐发。

其后，“小说界革命”的观点进一步扩大和深入，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改观。小说创作比较明确地被引导到面对现实、揭露批判封建主义罪恶的道路。随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衰落，以同盟会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崛起，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如黄摩西、徐念慈、章太炎对小说理论也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们对小说的社会作用评价较前客观，探索了小说的美学价值，较前更重视小说的艺术性。尤为值得提出的是，1903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运用西欧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观点，系统地评论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得出许多甚为精辟的看法。王国维政治上偏于保守，人生观偏于悲观，但其艺术观却是革命的。《红楼梦评论》可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优秀成果，其影响虽然不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那样宏大，却也客观地起着在艺术上补救梁文不足的作用。王国维的研究是作者自觉学习运用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解剖、认识、指导。这是小说现代化的有力组成部分，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红楼梦》研究。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小说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石破天惊。它们不仅初具理论体系雏形，其对视小说为“小道”、“末技”、“海淫”、“邪说”、“街谈巷

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①的传统观念的摧击力之猛之烈，将小说抬到文化殿堂最高处的呼声之高之壮，都是前人所未曾想过做过的。即使是最大胆的文化叛逆者，如李卓吾、金圣叹等人亦望尘莫及。在这些理论中，其根本核心是将小说从传统观念的“下流”解放出来，并提到新的高度，将小说从消遣的物品视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启发民智的工具。要求小说自觉地为社会、为政治服务。这种实用大于消遣观念的变化，开始意识到小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部分特点：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当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们远非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们的观点无意中客观地触到了小说的部分实质。他们从总结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中看到小说的作用，要求中国也照此前进。这种观念的现代化是促使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理论先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革命者们在理论上的倡导和翻译上的努力，拉开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序幕。

当然，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的理论中缺陷之处极多，诸如无限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导致忽略小说的美学本质，一味将小说当作工具武器使用，完全忘却了它们的审美作用。“政治小说”的提法，就含着小说被政治取代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们拿起小说作武器，其中未始不隐含着他们无法寻到更先进的政治斗争工具，姑且执起小说试试的急躁和无可奈何。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对前人有所匡正，却也未寻到更好的方法形式。于是，这些理论尽管一时喧声甚高，锣鼓敲得热火朝天，角色却迟迟不能登场。他们设计的新小说根本无法问世。这就是理论拔得太高带来与实践的脱节。果然，一阵紧锣密鼓之后，这些“小说革命”倡导者们也就悄然隐去。面对着民初汹涌而来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的小说逆流，康有为梁启超们不仅反击有心无力，甚至连反击的念头是否产生过也

^① 《汉书·艺文志》，见《二十五史精华》（一），189页，岳麓书社，1991。

是个问题。流亡中的梁启超始终不见再有一篇分量哪怕如《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十分之一的文章。这实在是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悲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学领域中的代表——南社，同样也难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予以明确的分辨，单看后来南社后期出版的《南社小说集》^①中收集了若干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小说，便可知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上的脆弱。如同他们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一样，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也是有限的。小说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还是有待于更强胜的力量，更有艺术气魄的巨匠来实现。

如同历史上许多革命运动一样，理论的倡导总是行走于实践之先。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也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实践的先行指导。一批小说作者，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用小说宣传革命，宣传排满。一些小说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立场上，用小说宣传改良，宣传君主立宪，尽管目的有所不同，对用小说为自己政治主张服务的意图是一样的。鼓吹“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自己从未写过小说，但为了实践自己小说现代化的主张，也兴致勃勃地执笔写出了《新中国未来记》，出过小说集《小说零简一册》，又译有长篇《十五小豪杰》。《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描绘理想的立宪运动的小说。作者不过是借小说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描画蓝图，既无人物、事件依据，又乏描写虚构的手段。这部作品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加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梁启超越写越勉强，自知“无以魔读者之望”^②，只写了四回便搁笔了。梁启超对

① 1917年4月文明书局出版，内收小说8篇，有周瘦鹃、王钝根、赵茗狂、闻野鹤等人的作品。

②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